

政府质量、公共支出与 居民主观幸福感

何凌云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受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子中关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城镇化、环境质量与居民幸福感研究”（项目编号：31541410411）
“政府质量、公共支出与国民幸福”（项目编号：31541410409）

政府质量、公共支出与 居民主观幸福感

何凌云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府质量、公共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何凌云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307-18201-1

I. 政… II. 何… III. 居民—幸福—研究—中国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4972 号

责任编辑:陈 帆 责任校对:李孟潇 书籍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2.5 字数: 181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8201-1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意义与主要问题.....	3
1.2 本书的框架	7
1.3 对书中重要概念的说明	7
1.4 研究方法与数据.....	10
1.5 本书的创新之处.....	12
2 文献综述.....	15
2.1 社会经济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7
2.2 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22
2.3 政府行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5
2.4 基于主观幸福感方法的公共物品价值评估.....	27
2.5 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31
3 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37
3.1 问题的提出.....	39
3.2 文献评述与理论假说.....	40
3.3 实证模型、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43
3.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8
3.5 本章小结.....	55
4 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不平等.....	57
4.1 问题的提出.....	59
4.2 文献评述与理论假说.....	60

4.3	模型、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63
4.4	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68
4.5	本章小结	73
5	公共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75
5.1	问题的提出	77
5.2	文献评述与理论假说	78
5.3	模型设定、指标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81
5.4	经验结果与分析	83
5.5	本章小结	89
6	环境公共物品与居民主观幸福感	91
6.1	问题的提出	93
6.2	文献评述与理论假说	95
6.3	研究设计	98
6.4	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102
6.5	环境治理的经济价值评估	111
6.6	本章小结	114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17
7.1	研究结论	119
7.2	政策建议	120
7.3	研究的不足	122
8	幸福研究展望	125
8.1	幸福区域差异研究	127
8.2	城市幸福研究	133
8.3	城市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差距与国民幸福	150
8.4	幸福的测度:基于叙述性偏好	156
	参考文献	171

1 绪 论

“不管国家的形式如何，宪法写着什么，它重要的目标都是增进居民的幸福。”（托马斯·潘恩：《人权论》，1791—1792）

“保障‘平民的幸福’应该是政府的基本目标。”（威廉·贝弗里奇：《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1942）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13）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我国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是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政府腐败滋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环境恶化等导致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甚至威胁到人的生存和发展。政府和社会在反思中逐渐认识到,经济增长只是一种手段,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使人不断获得幸福的增进。近几年,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结构、中国市长协会等社会机构、各大门户网站以及一些重要的报纸杂志社纷纷调查我国居民的幸福状况,并发布相关报告。“幸福”成了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尽管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经济增长的支撑基础和良好条件没有改变。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并加速转型,获得更多增长动力。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6.9%,仍处在世界前列。然而,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2016年发布的报告,中国大陆在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幸福度的排名中位列第83名。由此可见,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并不同步,这引发了政策取向的转变和学术研究的关注。面对国民幸福感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甚至下降的困境,政府如何作为?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是政府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研究认为,收入、收入不平等、教育程度、户籍和住房等因素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受有重要的影响。因而,政府能够通过资源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等方式有效提升居民的幸福水平。事实上,政府本身就是促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来源,比如,政府官员减少腐败和提高行政效率都能增进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本书将从政府的角度出发,研究政府如何能够增进居民幸福感。

1.1 研究背景、意义与主要问题

1.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幸福即使不是人唯一的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生活目标之一。功利主义学派大师边沁认为,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最大化人们

的幸福。然而测度幸福比较困难,经济学的发展主线逐渐偏离了关于幸福的研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学术界提出“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即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评价。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得到了证实和认可(Frey and Stutzer, 2002)。经济学家得以直接测度福利和效用,这为验证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和结论奠定了基础。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都掀起了研究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热潮。他们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女性比男性幸福,人在中年时最不幸福。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Easterlin 在 1974 年提出著名的“幸福—收入之谜”,即人均收入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学者从收入预期、相对收入和收入不平等等多个角度对之进行了解释。Guriev and Zhuravskaya (2009) 和 Rodriguez-Pose and Maslauskaitė (2012) 对俄罗斯和中东欧等转型国家的研究表明“幸福—收入之谜”困扰着这些国家。转型促进了经济增长并改善了居民收入状况,但居民的幸福感普遍较低。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历经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而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政府腐败滋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环境恶化等问题促使各界反思经济增长的质量。居民因“办事不便、看不起病、空气有毒”等感到焦虑和痛苦,他们的精神家园需要被呵护。“主观幸福感”作为综合反映个人生活状态的指标,在我国得到了各界的关注。朱建芳和杨晓兰(2009)、邢占军(2011)、张学志和才国伟(2011)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收入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其正相关关系有不稳定性。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赵新宇等(2013)认为“幸福—收入之谜”在我国已经出现。“幸福—收入之谜”的提出者 Easterlin 于 2012 年对中国进行研究后认为,1990—2009 年中国的经济保持着 8% 以上的增长速度,以不变美元计价的中国人均 GDP 和消费至少增长了 4 倍,而这一期间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呈倒 U 形,2009 年的居民幸福水平甚至要低于 1990 年。他们认为,这充分反映了转型国家收入增长与居民幸福感增长不同步的现象,政府推进

的改革导致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波动。比如,1995 年左右开始的国企改革导致大量员工下岗,而限制农民进城政策被放宽,城市就业岗位不足加之失业救济金的额度较低,导致这一时期居民的平均幸福水平大幅度下降。

学者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转型国家如何走出“幸福—收入之谜”的困境。大量的文献表明,政府具有权威性,控制着许多社会要素,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和实施良好的公共政策能够增进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Veenhoven, 2004; Helliwell and Huang, 2008; Ott, 2011)。Guriev and Zhuravskaya (2009) 认为,提高公共物品数量和质量能有效增进俄罗斯和中东欧等转型国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减少腐败也能帮助东欧转型国家改善经济增长与居民幸福感不协调的局面 (Rodriguez-Pose and Maslauskaite, 2012)。Easterlin (2012) 指出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高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学者还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完善住房政策等建议。增进社会福祉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和最终目标 (Layard, 2006),然而现有研究对政府行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还比较少。政府作为掌握公权力的组织,一方面,它维护市场秩序并纠正失序;另一方面,政府组织可能自身失灵并侵蚀社会福利。本书将从政府质量、政府公共支出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等多个角度研究政府如何能够让居民更幸福。

GDP 不能全面地反映国家的发展与进步,只有把居民幸福感作为政策讨论和制定的重要参考才能更好地保障民生。20 世纪 70 年代,不丹国王基格梅·辛格·旺楚克提出由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传承和政府善治四项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体系,引导社会发展目标从单纯追求 GDP 增长向幸福最大化转变。法国于 2008 年开发国民心理账户,将国民幸福感作为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和依据。巴西 2010 年将“寻求幸福”写入国家宪法,使公民的“幸福权利”受到法律的保障。中国政府也开始转变执政理念,更加重视民生问题和人文关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被认为是人民的“幸福指南”。

据统计,我国有一百多个城市在正式场合明确提出“幸福”

概念，将“幸福”列为施政目标。北京提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重庆提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武汉市在2012年着手编制《幸福城市专项规划》，将人民幸福与否作为衡量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根本标准。各地方政府以增加辖区居民主观幸福感为名而实施“幸福工程”和“民生工程”的实际效果值得关注。这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政府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以及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还知之甚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仅关系着国家的执政理念和公共政策在地方贯彻实施的效果，而且影响经济社会均衡和协调，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题中之意。

1.1.2 本书解决的主要问题

主观幸福感是个人对自身生活整体满足感的评判，用它衡量国民的福利水平已经成为普遍的做法。我国的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出现了“停滞”。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开始重视人文关怀，把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作为重要的执政目标。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制定社会制度和公共政策，是增加居民幸福感的先决条件。本书试图分析并尝试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政府质量是如何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政府质量和主观幸福感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是否存在差异？

第二，居民的幸福感受分布不平等问题在我国是否存在？政府质量能否影响居民主观的不平等问题呢？

第三，政府公共支出是如何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政府质量和公共支出的交互效应又是如何影响我国居民的幸福感的？

第四，政府质量和公共支出决定公共政策的效果和公共物品的质量，环境作为重要的公共物品是如何影响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利用主观幸福感评测方法，我们该如何评估环境公共物品的价值呢？

1.2 本书的框架

本书的理论结构框架如图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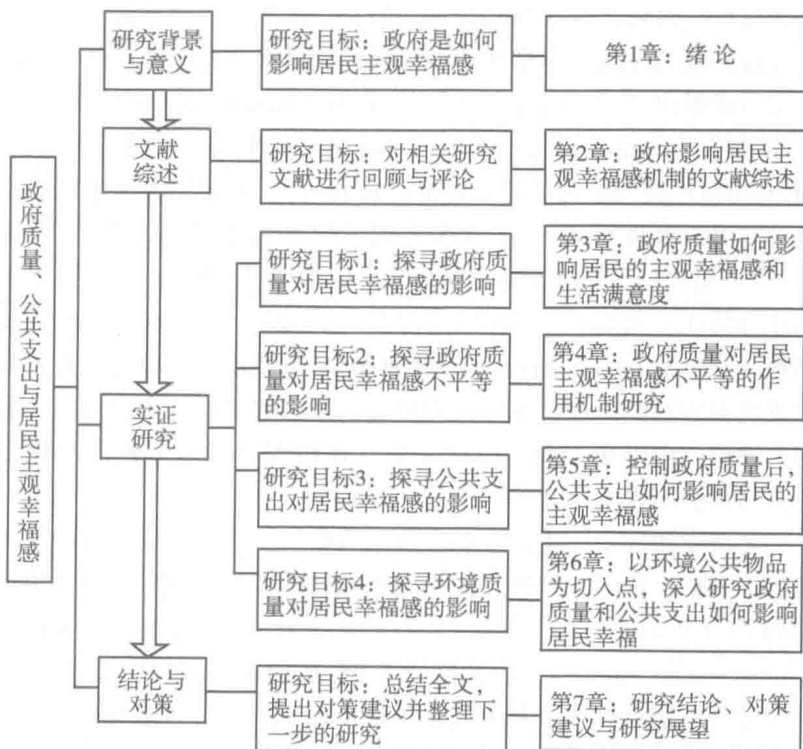


图 1-1 本书的结构框架

1.3 对书中重要概念的说明

1.3.1 主观幸福感

幸福是什么？这既是幸福感的本源性问题，也是研究的起点。Watermna（1993）说，幸福感是“每个人都知道其含义，但却无

人能够精确定义”的词语。界定“幸福”很难，对幸福进行衡量更难，对幸福的衡量可以划分为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传统上，有用收入或 GDP 衡量物质上的幸福感。但这一标准只能反映人类生活很小的一个方面。幸福是多维度的，人们开始创建教育、健康及环境等非经济指标来补充 GDP 标准。然而，关于综合的客观幸福标准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因素的争议很大，构建过程也非常复杂，因此通过主观的方式对多维度的幸福进行衡量得到了一致认可。经济学家明确提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概念，它与幸福（happiness）、快乐（happy）、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或者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具有相同的学术概念内涵。它可以被理解为“人们感受到了何种程度的快乐”或者是“一个人对自己整体生活状况的评价”，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等特征。主观幸福感由情感因素（affective component）和评价因素（evaluative component）两个部分构成。情感因素是指人正面的或负面的感觉；评价因素是指对自己生活的自我评价，是对一定的生命范围内抱负实现程度的考察。评价因素是基于判断和比较的，与情感因素是相互关联的。

经济学研究中使用的主观幸福感数据一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得到。目前，世界上调查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项目主要包括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美国综合社会调查（American General Social Survey）、欧洲晴雨表调查（Eurobarometer Survey）、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等。各个调查项目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提问方式十分相似，但也各具特色。比如，世界价值观调查作为主观幸福感研究最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通常用“将所有情况都考虑进来，目前您生活幸福吗？”的提问方式，要求被调查者在数字 1 到 4 之间进行选择，1 表示最不幸，4 表示最幸福。欧洲晴雨表调查的问题是“总体上而言，你对你的生活是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还是非常不满意”。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问题是“考虑所有的因素，你会怎样评价你这些天的生活呢，你认为自己是非常快乐、比较快乐，还是不那么快乐呢？”

大量的数据表明，调查的主观幸福感数据具有很强的有效性，

这是因为主观幸福感数据与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从客观角度对人幸福的衡量紧密相关。第一，自评幸福水平与笑容频率、面对压力时的心跳和血压等生理反应存在相关性（Ekman et al. , 1990; Pavot et al. , 1991; Shedler et al. , 1993）。第二，居民对自身幸福程度的感知与亲朋好友对他们幸福程度的评价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Sandvik et al. , 1993）。第三，实验研究拒绝了由于社会预期导致居民高估自身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原假设（Konow and Earley, 2008）。第四，主观幸福感得分越高的人自杀的可能性越低（Daly and Wilson, 2009）。

主观幸福感研究可以阐明经济理论，为其补充新的知识。通过研究决定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能够引导政策的制定。例如，我们可以根据它们会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来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例如，我们可以根据主观幸福感来分析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权衡取舍，从而采取一种使主观幸福感损失最小化的政策。制度质量能够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增加透明度和问责等政策是有依据的。

1.3.2 政府质量

政府质量，又称制度质量或政府治理水平，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Holmberg et al. , 2009）。目前还没有关于政府质量的统一定义。La Porta et al.（1999）认为政府提供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和较低的税负水平，在保持廉洁高效的同时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现了较高的政府质量。Samanni and Holmberg（2009）认为政府公正性是政府质量的核心。Fan et al.（2011）将政府质量界定为政府决策是否被合法地接受并执行，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并使其服务对象获益的程度。世界银行对政府质量的定义较为宽泛，涵盖民意是否能得到表达、政治稳定程度、腐败控制程度、行政效率高、法治水平等多个维度（Kaufmann et al. , 1999）。关于政府质量的定义，学者们各执己见，难以达成共识，但在如何度量政府质量的指标上的分歧则比较小，各领域文献主要选取了政府行政效率、法治水平、腐败控制水平等指标。我国学者还研究了政府质量

与公司现金持有、企业研发投资和财政分权等的相关关系。

居民的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政府质量的高低关乎政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仅靠政绩作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会出现“绩效困局”（亨廷顿，1998）。政府当前必须改变执政理念，应关注民生、增进社会福祉（居民生活满意度）以巩固其合法性基础。公共政策不仅是政府执政意志的体现，也应该是保护和实现居民合理利益诉求的保障。从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功能来看，它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变更和社会资源再分配最公正、最具合法性的工具。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价等过程影响人们的各种利益需求和满足。公共政策的价值特征包括实践效率、公平正义和社会发展。因而，改善民生、实现居民幸福最大化应该是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罗建文（2008）认为，“民生问题和民生幸福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能够完全解决得好的，必须有赖于公共政策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有效调控活动”。

1.4 研究方法 with 数据

1.4.1 研究方法

本书运用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文献综述是本书的理论基础。笔者广泛地检索和查阅了政府质量、公共政策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文献，同时跟踪了解官方机构、社会组织和传媒机构在实践方面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的最新调研和发布的报告。

在本书的第四章和第六章，笔者构建了经济理论模型。根据文献分析和理论假设，本书设立了由政府治理水平、预算、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效用等因素构成的理论模型，在进行数理推导后，得出了最优化结果。理论模型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科学性，为经验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实证研究部分主要使用了以下计量经济学研究的方法：最小二乘法（OLS）和有序概率模型或有序 Logit 模型

(Ordered Probit 或 Ordered Logit Model)。本书同时使用了两种方法,作为互相之间的稳健性检验。

1.4.2 研究数据

本书采用的数据库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03年、2006年和2010年三年的综合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中心合作,根据分层不等概率抽样方法,依区(县)、街道(镇)、居委会(村)、住户和居民的层次,对中国大陆居民展开问卷调查。在2003年度中,调查只包括了部分城市样本,2005年至2010年的历次调查同时覆盖了农村和城市。CGSS样本量大,覆盖地域广泛,具有较高的可信度。这一系列数据已成为学者们研究我国居民幸福感、价值观等问题的权威数据。笔者通过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网站登记注册并且提交数据使用申请,获得了数据资料,进而选择2003年、2006年和2010年三次抽样调查获得的全部数据展开政府对我国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在研究中,本书对那些在重要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予以了剔除。

CGSS数据对人口的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详尽的调查,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和处理,我们能够得到关于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是笔者研究中的重要控制变量。CGSS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调查,表1-1中列出了主观幸福感的调查问题和本书对该变量的处理方式。由于CGSS数据并不是面板数据,本书在每一个章节中根据具体的需要来选择CGSS数据。

除了人口社会经济变量和居民主观幸福感变量,本书还需要用到城市的GDP、城市化率、公共支出规模等宏观经济指标,这些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年鉴》等。在实证部分,笔者对具体使用到的数据来源有详细的介绍以及描述性统计。

表 1-1 CGSS 数据中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变量

数据库	关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问题	处理后的变量
CGSS 2003	总体而言，您对自己所过的生活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变量：主观幸福感
	1. 非常不幸福	1=非常不幸福
	2. 不幸福	2=不幸福
	3. 一般	3=一般
CGSS 2006	4. 幸福	4=幸福
	5. 非常幸福	5=非常幸福
CGSS 2010	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变量：主观幸福感
	1. 非常不幸福	1=非常不幸福
	2. 比较不幸福	2=比较不幸福
	3. 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	3=居于幸福与不幸福之间
	4. 比较幸福	4=比较幸福
	5. 完全幸福	5=完全幸福

1.5 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一，本书从政府质量、公共支出和公共物品供给的角度阐释了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丰富了国内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的经验证据。有的学者研究了收入、收入差距、住房等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仅仅解释了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动的一小部分原因。我国如何才能走出“幸福—收入之谜”的困境，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现有的研究为如何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但很少有研究直接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来关注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本书从政府质量、公共支出和公共物品供给三个角度研究了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祁玲玲和赖静萍（2013）研究了南京居民对政府腐败的主观评价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是腐败仅仅是政府质量问题的一个方面，关于政府质量